

托派不断革命论的历史语境与当代局限

——基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

吕佳翼

(浙江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23)

摘要:民主革命嵌入于社会主义革命中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两大内容。前者是托洛茨基对马、恩理论的一种发展,基本切合了俄国革命的实际,与列宁后期的观点也基本一致;后者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识,也是列宁主义的题中之义,但当代托派对这一理论的沿用及其革命实践存在较大缺陷,这一缺陷可以追溯到自托洛茨基以来的哲学基础中。

关键词:不断革命论;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世界性;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D1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1-0072-09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1.011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ntemporary Limits of the Trotskyist Theory of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LV Jia-yi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embedding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re the two major elements of Trotskyist theory of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The former was the Trotskyist development of Marx and Engel's theories of revolution, which conformed to the feature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s later thoughts. The latter was the common view of classic Marxism including Leninism.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efec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by Trotskyists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rotskism.

Key Words: theory of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ic revolution; universality; ontology

基金项目: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10039);2015 年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科预研基金(GZ152105054800)

作者简介:吕佳翼(1986—),男,江苏无锡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研究。

不断革命论是从托洛茨基到当代托派始终坚持的基本理论,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要影响并至今余脉犹在的重要思潮,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对之的妖魔化到“后革命”时代的边缘化,一直以来未曾得到非常客观理性的检视,从而使得对它的批判建立在本身错误的前提上,这样既不能正确认识它的历史渊源和合理内涵,也不能真正揭示它的问题所在。以下我们从托派不断革命论的两大理论支柱论述其历史渊源和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合理内涵和弊病所在,以此为科学社会主义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某些反思。

一、不断革命论的第一个根本观点:民主革命嵌入于社会主义革命中

不断革命论的第一个根本观点——民主革命嵌入于社会主义革命中——是围绕1905年的俄国革命而提出的。就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内部并无分歧,分歧在于这场革命的领导权、它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而这些分歧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视域中,它与1848年德国革命一样,是一场过迟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

(一)列宁与孟什维克的分歧

1905年革命前夜,争论的焦点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孟什维克派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和主体理应是资产阶级,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认为虽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但在无产阶级已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应由以无产阶级为先锋的工农(整体农民)联盟来完成此革命。在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就革命领导权的争论上,托洛茨基站在了列宁一边。孟什维克派的观点其实就是马、恩原先持有但后来又被他们自己扬弃

了的观点。而列宁是从马、恩后来的观点出发,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序言”中说:“我只记得,在文章(指该文原稿——引者注)的结尾部分,我还引用了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两段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没有能理解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1]413}因而,正确的当然是列宁。

(二)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前期分歧

然而,1905年革命之后,争论的焦点已由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转移至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原来,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外,在1905年革命问题上还有托洛茨基的第三派观点,虽然在反对孟什维克的观点时托洛茨基站在列宁一边,但托洛茨基与列宁的观点仍有分歧。列宁认为,这次革命虽是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毕竟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应建立的是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农民主专政,革命的前途并非直接通往社会主义,只有当这一革命完成并推动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之后才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二阶段革命论,但与马、恩当时的二阶段革命论又有所不同,因为它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是以无产阶级为先锋的工农(整体农民)联盟,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因而是一种变形的二阶段革命论。

托洛茨基虽也不否认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不否认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认为不能建立工农的联合专政,而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既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它也就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或者说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因此,可以说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应是包含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来完成的。既然如此,

也就不可能分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而是一阶段革命论。

两者的分歧归根结蒂在于: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还是建立得到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两者的区别是十分微妙的,托洛茨基的得到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允许农民代表加入政权,但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是该政权中的多数派,从而掌握领导权;而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对于领导权问题未在工、农之间做出明确界定。可以说列宁的公式包含了托洛茨基的公式,托洛茨基的公式是列宁公式的明确化。因而,托洛茨基也并不认为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就是错误的,而把它比作含有未知变量 X (X 即农民的革命作用)的代数式,这个未知变量 X 保持着随具体情况而变动的未定性。但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个 X 会上升到使农民在该政权中取得领导权的程度,而列宁对这个 X 的阈值未作界定,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他们都以上文所引的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致恩格斯信中那句关于德国革命的话作为自己理解的基础,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列宁得出了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托洛茨基则得出了得到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他这样评论马克思的这句话所标志的思想转变:“当时(即在上文提到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引者注)马克思所期待的是在德国出现一个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也就是说,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在农民的支持下暂时掌握政权。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这也正是没有发生的事。而且没有偶然发生过。早在上世纪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表明自己没有力量实现它自己的独立的革命。马克思是考虑到这个教训的。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即在上文提到的传单发表以后六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

阶级革命为转移。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这一段被拉狄克完全忘记了的话,是了解十月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全面探讨的整个问题的真正宝贵的钥匙……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是不是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合作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是必要的呢?是的,他是认为必要的。他是不是认为农民有可能在革命中担任领导角色或者甚至仅仅担任一个独立的角色呢?不是,他并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

托洛茨基认为,由于农民——这里特别强调是指整体的农民,因为列宁所谓的工农民主专政或工农联盟是包括整体农民的——社会构成是不同质的,他们在革命中会出现分化,或者追随资产阶级,或者追随无产阶级,而不会形成一个利益一致的农民党,因此不能让农民参与革命的领导权。那么,对于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这种分歧,历史是如何裁决的呢?

(三)二月革命后列宁观点的转变

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直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才成功,1917年3月俄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如所周知,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权和工农民主专政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其实政权一开始已经落入工农手中,只是由于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受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2]27},而且即便如此,政权的实际力量也还是掌握在工人和士兵手里。因此工农和士兵完全可以也应当把政权取回。但这就需要同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而这一点在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公式中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公式把作为整体的农民囊括进来,恰恰不能与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因此,列宁在1917年4月的《论策略书》中指出:“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

……实行分裂。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2]26}这个新任务可以看作是对上述代数式中X之值加以确定，限制农民在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比较接近于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了。在农民问题这个关节点上，列宁的确取得了与托洛茨基一致的观点，如列宁1919年《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2]827}（列宁在同一段中又重复了这同一句话。）

因而，要回答二月革命后是否实现了列宁预期中的工农民主专政，答案是既是又不是，列宁《论策略书》中对此做了辩证的回答，总的说来偏向于不是，而且由于革命任务的变化，这个公式已然成为过时的。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但对此加注道“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并接着说：“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结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2]26-27}

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按列宁原先的设想，应在完成这一革命后，才进入革命的第二阶

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此时列宁提前作出了由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决定，如列宁在1917年《四月提纲》中所说：“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2]14}顺便指出，这里列宁提到的已是“贫苦农民”，而不再是之前的整体农民。

列宁革命策略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使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结合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在某种程度上已使革命的两阶段合并成了一阶段。综上所述，在二月革命后，以《四月提纲》为标志，列宁的革命理论发生了一个较大的转变，逐渐接近于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则在组织理论上向列宁靠近。

那么，列宁是否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完全认同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呢？不少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么认为，如外国的曼德尔和中国的郑超麟等。《托洛茨基自传》中提到的越飞诀别信中的一段话也佐证了这一点。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1883—1927）是前苏联外交家、革命家，托洛茨基好友，他在1927年反对不断革命论运动的高压之下开枪自杀，临自杀前留给托洛茨基一封诀别信，其中说：“我曾不只一次向您提起过我亲耳听列宁说，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现在在我再一次重复这句话。”^[3]第四十二章托洛茨基曾为越飞的安全考虑，阻止他说出，因此越飞在自杀前给托洛茨基的诀别信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但也有持保留态度的，如日本的托派学者对马忠行。他认为像列宁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完全摒弃了这个曾经的重要论点，一定会在著作中加以说明，但事实上，列宁虽然以后的确较少使用这个提法，

但并没有明确地否定之。他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各对了一半,因为虽然二月革命后实现的工农民主专政发生了重大的变形,并随着新的革命任务的提出立即成为过时,但毕竟短暂地存在过这个阶段。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结论性地指出,十月革命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也许仍有差异,但已很难再说存在着分歧和对立。

(四)被捏造的对立

不顾上述史实,把列宁与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论上曾经存在过的分歧以及后来演变成的差异,夸张到无可调和的敌对程度,这完全是斯大林派的事后捏造。列宁十月革命前的著作中的确有不少与托洛茨基的争论或对托洛茨基的批评,给斯大林派的捏造提供了材料,但对此需注意如下几点。①十月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在组织问题上曾有较长期期的分歧,托洛茨基只是在十月革命前不久才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这种组织上的分歧不能不影响到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但如上所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托洛茨基在组织问题上向列宁靠近,正如列宁在革命理论上向托洛茨基靠近一样。而且,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向党内特别指出,不要以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为由反对他。②以不断革命论本身来说,如上所述,列宁在二月革命前后自己的观点有一个重大转变,不能以二月革命前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批评作为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定论。而且,1919年之前列宁没有读到托洛茨基系统论述不断革命论的长文《总结与前瞻》,而把帕尔武斯的话误当成托洛茨基的,但在1919年列宁有机会读到它后,恰有了与越飞的上述对话。③列宁著作中某些反对托洛茨基的话,有可能是借反对托洛茨基之名而反对其他人,这是列宁常用的论战方法。④列宁后期著作中对托洛茨基的高度肯定甚至赞赏却被斯大林长期删改、掩盖了,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总之,将列宁与托洛茨基在

组织问题、革命理论上的早期分歧固化,而无视上述发展过程,是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制造的迷雾。

实际上真正违背列宁主义的是斯大林派,在中国的国民革命(1924—1927)中,斯大林派把持的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放弃自身独立性而加入国民党,这不仅取消了中共对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取消了中共的独立性,倒退到了连孟什维克也不如的水平,因为孟什维克虽然主张把资产阶级革命的 leadership 交给资产阶级,但至少还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独立的反对党。这个决定当然为托洛茨基派所反对,后来蒋介石的叛变果然对中共造成重大损失。

二、不断革命论的第二个根本观点: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

不断革命论的第二个根本观点——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不断性——也就是世界革命论的观点。世界革命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开始,但必须完成于世界舞台,社会主义革命和通往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长期孤立于一国或少数国家,特别是落后的一国或少数落后国家。与它相对立的,当然就是斯大林的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马、恩从来都是在世界视域中谈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列宁究竟是世界革命论者还是一国社会主义论的首倡者就有所争议了。

其实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列宁只是提出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可以率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但决不认为革命的胜利和通往社会主义的建设可以长期孤立在一国,相反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翻一翻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列宁数十次地谈到苏联的维系以及进而向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端赖世界革命特别是发达国家革命的发展。

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总共出现两次(《论

欧洲联邦口号》和《论合作社》)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模棱两可的说法,后来被斯大林利用来证明他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但稍微深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两处也没有违背列宁在其他多处所强调的世界革命思想。因此,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始作俑者只能是斯大林本人,列宁是一国社会主义论的首倡者之类的说法也无非是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炮制出来的误解。其实斯大林也只是在1924年秋以后才提出这个理论,在此之前在苏共党内这个理论连影子都没有,而且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产生这个理论。就在1924年初,斯大林本人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的初版中还表达过需要多个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思想;当然在再版时这段话被删掉了。因此,也只是在这以后,世界革命的思想才凸显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才成为托洛茨基的专利。而在此之前,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至于在世界经济的视域中一国社会主义论何以必然不能成立,已在拙作《试论1925—1927年苏共党内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之争——权斗背景下的理论分歧》一文中作了详细分析,此处不赘。

三、不断革命论的当代局限——基于本体论的视角

不断革命论的历史合理性也决定了它不具有抽象的真理性,脱离开产生它的具体历史条件,把它抽象化、教条化,就成了黑格尔所谓的脱离具体内容的“主观反思”,一种无视主客体辩证关系的空洞口号。这大概就是不断革命论的当代命运走向。但为了更深入地反思这一问题,反思当代托派的革命战略,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略加探讨,并在此过程中与第二国际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作一点横向比较是有益的。

(一)自然辩证法:托派的本体论基础

这种哲学本体论基础需要追溯到托洛茨基本人。从我们现有掌握的材料来看,托洛茨基本人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专门论述,但他在论述其他问题时所表露出来的自然辩证法(也即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在托派来说,这两者是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保卫马克思主义》这一辩论文集集中,托洛茨基在论述苏联社会性质、驳斥论敌时,多次论及辩证法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辩证法在这里主要被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过程性,包括事物发展中自我否定的观点、质量互变的观点,以及辩证法的这些观点中所蕴含的革命性。据此托洛茨基指出,一个人现实的政治立场似乎与他对辩证法的态度毫无关系,但实际上两者紧密相关,离开革命阵营的人往往以抛弃辩证法为开端。托洛茨基的这些观点应该说并无超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之处,只是对后者的运用。而且在运用它们分析现实问题时,应该说也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托洛茨基在这些辩论文章中是在为下述观点辩护,即苏联的蜕化并未超出工人国家的范畴,而这一观点实际上并不成立。由此可见,这种辩证法本非包治百病的药方。

托洛茨基的自然辩证法观点也体现在他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和自然科学家的评论中,他在被贬职为电气技术管理局和工业科技管理局领导人期间,一度对这个问题颇感兴趣并发表过相关论述。“人的思维的统一性及其多样性是托洛茨基的重大主题。他再次以门捷列夫的著作为起点,考察了现代科学的结构。门捷列夫已经发现,化学的基础是物理学,而化学反应是由粒子的物理性能和机械性能引起的。”^{[4]191}在此基础上,托洛茨基同样地把化学作为生理学的基础,又把生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基础,也即:物理学(特别是力学)→化学→生理学→心理学。托洛

茨基认为,虽然各个领域有其特殊规律,而不能将这四者混为一谈,但从“归根结蒂”的意义上,后者总是以前者为基础,或者说总是前者的某种推演,因此整个现代自然科学“归根结蒂”建立在物理学特别是其力学定律上,它是说明一切自然科学问题的原始基点。顺便说一下,正是从心理学建立在生理学这个角度出发,托洛茨基为弗洛伊德的学说辩护,认为它可以与唯物主义相容,认为它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前者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因而常常夹杂着不可靠的内容。总之,“托洛茨基广泛回顾了‘最近几十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哲学上的含义。他断言,这种进步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几乎从未间断的胜利”^{[4]193}。最后,这一自然辩证法甚至把现代社会科学、人类社会领域也纳入进去,如多伊彻在转述托洛茨基的观点时所说:“现代社会科学是与人类在探究支配自然的法则中所获得的洞察力分不开的;它把社会视为自然的一个特殊部分。”^{[4]192}至此,自然辩证法作为本体论基础的地位昭然若揭。

后来的乔治·诺瓦克和曼德尔完全继承了这一观点。诺瓦克是一位美国托派,托洛茨基曾令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多作努力,回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歪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护,他也果然不负使命,在这方面著述颇丰,成为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坚决捍卫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保卫恩格斯》这一长文,在这篇文章中诺瓦克继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传统,明确论述了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坚决抨击了以实践观点偷换这一本体论基础的各派哲学。由于这种观点不仅与上述托洛茨基的观点一致,而且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比较接近,所以就不作展开了。

(二)自然辩证法与不断革命论的脱节

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这种本体论基础与

作为托派之根本(乃至全部)理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解释的基本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他们的本体论基础也是自然辩证法,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作为自然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之延伸的经济决定论。从本体论基础来看,第二国际与托派并无原则区别。但第二国际从这一本体论基础逻辑地得出所谓的坐等革命论,实即放弃革命斗争;而托派却是以高扬革命斗争旗帜著称。另外,作为第二国际理论的对立面,卢卡奇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没有历史主体参与的自然辩证法,确立了强调无产阶级主体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实即为高扬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革命主动性的作用奠定本体论基础。而托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把自然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第二国际)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作用的强调(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非逻辑地结合在一起,中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逻辑的断裂。

为了确定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曼德尔在《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这本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小册子中的一段话。顺便说一下,这本小册子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分为两章,而且两者之间缺乏逻辑上的联结。上述的那段话说:“历史的辩证法,起初这主要是客观上的,但是,到了无产阶级起来根据预先决定的计划来改造社会的时候,这个革命方案的出现,使历史辩证法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使历史辩证法变成客观与主观交互作用的了——译注)——虽然这个方案的制作和实现是联系于客观的现已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是不受人类意志决定的。”^{[5]第十六章}

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客观(自然)辩证法与主客观辩证法之间的联结与转化,用引文中的话说,它们统一于“历史辩证法”。然而,姑且不说这种“历史辩证法”的基础仍

然是自然辩证法,我们要问的是,这两者(自然辩证法和主客体辩证法)之间的转化是如何实现的?如果说在以前的时代中,都是靠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或者换个说法也一样,即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它的自然发展),那么,为什么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客观(自然)辩证法已经不足以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已经不足以保证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而需要主客体的辩证法,也即无产阶级独立于客观规律(或自然辩证法)之外的独立能动作用了?按照自然辩证法或客观规律的逻辑,以前的社会形态的转化(如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不需要在此客观规律以外强调革命阶级的主体作用,因为它们革命作用是由此客观规律必然决定的,或者说已经被此客观规律包含在内,也就是说它们的革命作用是必然会发挥的,尽管它们不一定自觉意识到。那么,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为什么这种自然辩证法或客观历史规律就再不能如此自动地发挥作用,为什么客观历史规律中不再包含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不再必然地决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而需要特别地在客观规律以外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托派一反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把无产阶级的主观因素说成决定性的,如曼德尔所说:“在我们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历史的主观因素’(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领导)对于决定阶级大战的结果,决定全人类的前途,起一种原始性的作用。”^{[5]第十七章}实际上,曼德尔和托派深感客观规律是不可能决定无产阶级必然发挥革命作用,不可能决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里感到了自然辩证法或客观规律论的不够,因此,需要强

调无产阶级在客观规律以外的能动作用,这反映在哲学上,就是求助于主客体的辩证法。因此,曼德尔上述那段话中所谓的自然辩证法向主客体辩证法的转化,无非反映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实际困境,并企图通过将主客体辩证法外在地嫁接其上来解决这个困境。然而,这与它的本体论基础缺乏内在的统一性。

这两者的结合表现为实际结论上的一种奇怪的折衷:一方面,按照自然辩证法或客观规律论,资本主义必然垮台,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从经济规律上论证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要求的主客体辩证法,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匮乏或革命行动的失策,都将导致社会主义的难产。从而曼德尔认为人类将面临这样一种前途,即资本主义灭亡而社会主义没有来临的“野蛮主义”或者人类灭亡。简言之,托派理论中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它的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崇奉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把阶级意识这一主观方面夸大和强调到脱离实际历史情境的程度,从而把这两方面打成两橛。

根据以上的论述,托派的本体论基础与其不断革命论之间是存在脱节的。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在革命的实战经验中,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作了出神入化的发挥,但并没有自觉到它的本体论基础问题;而在涉及哲学的“显问题”时,他则沿袭了来自第二国际的传统观点(包括列宁前期的哲学观点)。但是就不断革命论本身来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世界性视域中,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直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等创造性论点,在本体论层面上是不能自限于自然辩证法以及与之相应的所谓客观规律论的,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这一本体论基础的突破,只是尚未提升到对其本体论基础的自觉论证。如果说托洛茨基由于革命节奏的紧迫和后期生活的

危机根本无暇深入这项工作,那么后来的托派并未对此有何推进,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了。这无疑构成了托派理论体系中的某种不足。同时,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在一种理论的本体论基础与它对革命的实际态度之间并无直接的或绝对的决定关系,托派的自然辩证法并没有决定它对革命的消极以待,正如某些高扬阶级意识、实践哲学的理论家在现实中却十分畏惧革命。

(三)本体论视域中不断革命论的当代局限

哲学本体论与革命理论之间在托洛茨基那里尚是潜在的理论脱节,到了当代托派这里凸显为一种明确的断裂,这是一种由于在其哲学基础中缺乏主客体互动的辩证法而导致的理论困境,这是客体决定性与主体能动性在其本体论基础中爆裂为两端的表现。如上所说,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解释的基本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他们的本体论基础也是自然辩证法,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不过是作为自然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之延伸的经济决定论。而作为对第二国际理论的反拨,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没有历史主体参与的自然辩证法,确立了强调无产阶级主体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实即为高扬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革命主动性的作用奠定本体论基础。正如有的论者指出,在本体论基础中爆裂为两端的客体决定性与主体能动性,分别为上述两派各执一端。而在托派,这爆裂的两端却被它的本体论和革命理论分别据有,从而导致两者的割裂,这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二战后当代托派的某种理论困局与实践缺失。

在理论上,具体表现为忽视资本主义客体的具体情境和部分质变对工人阶级主体阶级意识的决定性重塑(这方面倒是为诸多西

方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地发挥了),脱离实际地高扬和诉诸阶级意识,造成了对不断革命论的超经验运用,从而陷入了某种革命激进主义的乌托邦。在实践中,当代托派缺乏一个着眼于近期的改革方案,不顾条件地把革命置于议程之上,不仅否认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以及在缓和矛盾、延缓革命上所确实起到的作用,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局部反抗运动也评价不高,认为在不把它们整合进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诉诸根本性社会革命的情况下,就只有十分有限的意义。这就使他们对现实政治缺乏任何建设性的或改良性的应对方案,任其对革命的期许和热情在难以兑现的延宕中耗散殆尽,这是当代托派在一个所谓“后革命”的时代中,无论在理论创造力还是现实影响力上均显得力不从心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M].石瓮,施用勤,张以童,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 [4] 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M].周任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5] 曼德尔.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M].向青,译.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rnest-Mandel/1977book/16.htm>.

(责任编辑:李秀荣)